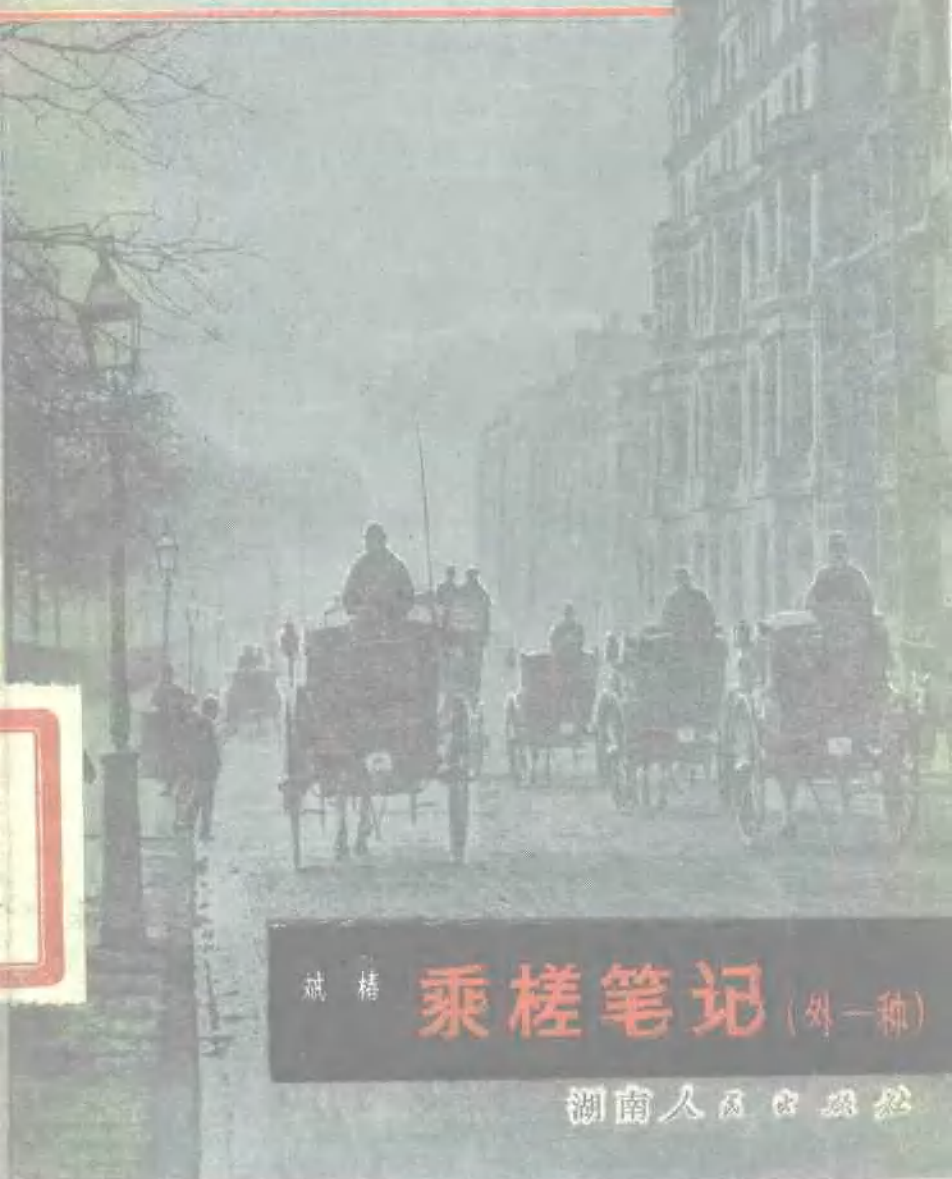


从东方到西方的最早的脚步
中国人对欧洲的最初的观察



斌 椿

乘槎笔记 (外一种)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乘槎笔记(外一种)

斌 格 著 谷及世 校点

责任编辑:钟叔河

装帧设计:易 地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100,000 印张:5.23 印数:1—10,000

统一书号:11109·474 定价:0.53元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总序

人们常说，今天的世界，是一个“迅速缩小的世界”（rapidly shrinking world）。在电视卫星、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，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，好象越来越短；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，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。

可是，仅仅在几代人以前，“异国”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。古代欧洲人说，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，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，就从里面取出丝来（波桑尼阿《希腊纪事》Ⅶ.XXⅦ.6—9）。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，西方有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，脐带还连着大地（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拂菻一节，清代康熙朝御制《渊鉴类函·边塞部九》）。这类“海外奇谈”，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；而在过去上千年中，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，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。由此可见，人类文明的发展，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。

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，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。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一样，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、玄奘、鉴真、郑和、马哥波罗、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。可以这样说：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，往往也就

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。

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。当黄河、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，泰晤士、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，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。而自文艺复兴、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，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。在西欧（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）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，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。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，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，林则徐首当其冲，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，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。

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在“严夷夏之大防”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。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？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。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，见到“洋人”就“以扇蔽面”。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“杀尽洋人”，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，自己的命却送掉了。林则徐、魏源等则不同，提出了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那就是：学习外国的长处，来对付外国的侵略。要学习，先得了解，于是林则徐编了《四洲志》，魏源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，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，难免有许多谬误。但无论如何，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。

林则徐、魏源之后，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，到欧美日本去学习、游历和出使。容闳1847年留学美

国，斌椿、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，志刚、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，这是最早的。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，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，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（现）代的科学文化、政治思想，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。

《走向世界》这部丛书，收的就是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。“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”（毛泽东：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）丛书以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。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，但所处地位重要，写的书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，只要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，也酌予收录。

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，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，值得中国人学习。但是，资本主义的本质，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。中国人走向世界、接触西方，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，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。盲目排外的情绪是有的，盲目崇外的情绪也是有的。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的这类观点，我们为这套丛书撰写的评介文章，将适当地作些分析，请读者注意。

“洋为中用”是我们今天的主张，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。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不也是“洋为中用”吗？当然，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，人们慢慢地看出：仅

仅学一点“长技”，搞一点坚船利炮，还是不行的。“要救国，只有维新”，维新行不通，就只有革命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，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，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。历史无情亦有情，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，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，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。

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。但是，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，我们的经济、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。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，走向世界。打开眼界以后，还要学会分析，分清好的和坏的。一切好的东西，要“拿来”为我所用；一切有害的东西，要实行抵制和预防。在这方面，前人的观察和体会，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。

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，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、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。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，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。是为序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七月

两千年岁月，五万里行程

——从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到《乘槎笔记》

钟叔河

哥伦布以前，海洋环绕的亚欧大陆，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。中国在极东，欧洲在极西，隔开五万余里，相互而言，都是“远在天边”的“世界的尽头”。

那时候，在世界上旅行是不容易的。庄子写《逍遥游》，描写鲲鹏变化，“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，真是汪洋恣肆，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可是，当笔锋转向人间世时，连他也不能不如实地承认：“适百里者宿舂粮（去百里外的地方，得在先天晚上预备干粮），适千里者三月聚粮（去千里外的地方，得带上三个月的口粮）。”这就是当时出门旅行的实际情形。

然而，人决不会永远甘心受局限。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世界变得宽大一些、丰富一些，希望能够了解别处的生活，得到别处的经验。于是，随着贸易和财富、国家和权力的出现，就有了长途转运的商人，有了交通联络的使者，有了走向世界的旅行家，也有了对于远方外国的的好奇和希

望。

关于西方世界的情形，中国在远古就有过不少传说，如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之类。可靠的史料，至少可以上溯两千年。但直到一百几十年前，才有人亲自到欧洲记下自己直接观察的结果，——这就是《乘槎笔记》和《海录》，在此处合印为一册的两部书。

* * *

《海录》由一位盲人于1820年口述，经别人笔录整理而成。《乘槎笔记》则是1866年开始到欧洲游历的人的日记。论出世，《海录》在《乘槎笔记》之前；论内容，《乘槎笔记》却在《海录》之上。

《海录》的口述者谢清高，广东嘉庆州（今梅县）人，年轻时在海上遇险，被外国商船救起后，留在船上工作。此后十四年中，他遍历南洋、印度和欧洲；后来回国，不幸失明，在澳门以口译为生。他的乡人杨炳南，听到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，多为过去书籍所未载，觉得很有价值，于是将其记录整理成书，刊行于世。此次据《海山仙馆丛书》和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两本校勘，酌予分节标题，并重订目录。

《乘槎笔记》的作者斌椿，是一位年老的读书人。他出身汉军旗，当过知县，能文能诗，关心时事，跟地理学家徐继畲、大数学家李善兰等是朋友。同治三年，他被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所属“总税务司”英国人赫德请去“办理文案”，开始接触洋务、洋人。同治五年，总理衙门派同

文馆学生出洋游历，需要一位“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”。六十三岁的斌椿担任了这个差使，“身之所至，目之所见，排日记之”，后来整理刻印，以《乘槎笔记》书名传世。此次据原刻本校点排印，除二月十八日记新加坡土人删去四十字，四月二十三日赴英王宴舞官会宴感想删去二十九字外，完全保持原貌，只增加了月份标题和目录。

在《海录》和《乘槎笔记》之前，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，全部得自传闻，从来没有过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。这两部书一前一后，跟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不过二十年，正值中国人从“闭关锁国”的状态中惊起，开始面对剧烈变化的世界之时。它们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又一块里程碑。

经过了两千年岁月，才终于从东头走到西头，走完这五万余里行程；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，一条漫长的道路。

* * *

中国人最早得到的西方的信息，记在司马迁（公元前145——86?年）的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里。书中说，汉朝向西方派出的使者，最远曾到达罗马帝国亚洲属地的东陲；接着安息（今伊朗）使者随汉使来中国，又带来了“黎轩善眩人”（罗马的表演魔术的艺人）。据杜佑《通典》记载，艺人共有二位，“皆蹙眉峭鼻，乱发拳须”（粗眉毛、高鼻子，卷曲的头发胡须），无疑是欧洲人。

欧洲古时称中国为“赛里斯”（希腊文 *Σeres*，拉丁文 *Seres*）。这个名称是从“丝”字派生出来的，因为中国是

产丝之国。罗马学者白里内(公元23—79年)的《博物志》说:

“赛里斯人林中产丝,织成锦绣文绮,贩运至罗马。……由大地东端运至西端,故极其辛苦。”可见早在二千年前,中国和欧洲之间就已经有了一条“丝绸之路”。中国商人并未到过罗马,却频繁地接触着从事贩运的中亚和西亚的“胡商”。在这条路上来往的商人和使者,把辗转传闻的一些消息带到了东方,比如:

“大秦国贡花蹄牛,其色驳,高六尺,尾环绕其身,角端有肉,蹄如莲花,……迹在石上,皆如花形……”(《别国洞冥记》)

“大秦国地方数千里,有四百余城,小国役属者数十。以石为城郭……宫室皆以水晶(晶)为柱,……有夜光壁,明月珠、驳鸡犀……有飞桥数百里,可渡海北诸国……”(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)

这些传说,有的真实可信,有的则正如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曄自己所说,“请怪多不经”。这是缺乏直接观察、全凭道听途说不可避免的毛病。

* * *

魏晋以后,宗教盛行,志怪、传奇,蔚为风气,西方来的传闻往往更蒙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。

唐人张说的《梁四公记》,述梁武帝时有四个老人来中国,给“诸儒”讲述西方奇事,说拂林国(即罗马)“岛西北有坑,壘壘深千余尺,以肉投之,鸟衔宝出,大者重五斤,彼云是色界天王之宝藏。”这就是《一千零一夜》中“水

手辛巴德 (Sindbad The Sailor)”的故事，云沙漠中有一深谷，满积宝石，四周为绝壁，人不能上下。取宝者杀羊剥皮，投入谷中，大鹰入谷叨羊，肉上粘着的宝石即被带上。这个故事，公元三世纪时已在希腊、罗马广泛流传。传来中国后，文人把它当成纪事，定在梁武帝时，又跟“色界天王”这样的佛教名词扯在一起，弄得亦真亦假，神秘离奇。

又如唐人段公路《北户录》中的一则：“拂林国有地生羊。其羔生土中，国人筑墙围之，脐与地连，割之则死。但走马击鼓以骇之，惊鸣脐绝，便逐水草。”这也是伏尔加河和里海一带的民间故事。传入中国后，唐人把它和真人真事混为一谈，宋代修新旧《唐书》都予以收入，《本草纲目》也将其列为专条，真是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了。

史书中类似的东西还很多，如“有一鸟似鹅，其毛深绿，常在王边，倚枕上坐。每进食，有毒，其鸟辄鸣。”（《旧唐书》）“小人（国），在大秦之南，偪才三尺。其耕稼之时，惧鹤所食，大秦每卫助之”。（《通典》）……

这些材料，在对神话和民俗进行比较研究时是十分有用的。但是，拿来当作关于外国的实际知识，那就完全不行了。

* * *

在漫长的历史上，中国也有过旅行家，写过一些亲身经历的游记。如东汉班勇的《西域风土记》，孙吴朱应的《扶南异物志》和康泰的《外国传》，唐代杜环的《经行记》等

等。他们的行踪虽然并没有超出亚洲范围，但是毕竟从中国向西走了很远，一定听到了不少关于欧洲的事情。可惜这些书都已散佚，一本也没有留下来。

杜环的《经行记》，在《通典》中还保存着很少几条。其记拂菻国云：“其人颜色红白，男子悉着素衣，妇女皆服珠锦。好饮酒，尚干饼。”“其俗每七日一假，不买卖，不出纳，惟饮酒，谑浪终日。”这里所说人的肤色白中透红，男人穿单色衣，妇女好装饰，喜欢喝酒，多吃面包、饼干，每七天工作一天，休息游乐等等，确实是东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。

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旅行去外国，但有机会亲自接触来中国的外国商人和使节，他们的记载也是比较真实可信的。如：唐代裴矩《西域图记序》（全书已佚，只留下一篇序），记录了中国通罗马的三条商路。宋代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，记大秦国王每七天到礼拜堂做礼拜。宋代赵汝适《诸蕃志》，记斯加里野（意大利语“西西里”的读音）有火山，爆出石块如浮石。这些记载，也和欧洲实际情况相符。

至于玄奘、法显、慧超等佛教僧徒的出国记传，主要是记印度佛教的事情，偶尔涉及拂菻、拂临，也多属传闻，而且十分简略。

*

*

*

蒙古人武力征服欧亚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大变化。蒙古人和色目人（包括欧洲人）一度可以在亚欧大陆上通行无阻。西方的“中世纪四大旅行家”，都有关于中国的旅

行记传世，尤以马可·波罗最为著名。中国的汪大渊、杨枢、常德、刘郁等人，也旅行到了西亚。汪氏的《岛夷志略》和刘氏的《西使记》所讲到的“佛朗国”（“富浪国”），就是法兰克王国的波斯读音，是波斯人对欧洲的泛称。

明朝消灭蒙古贵族对“汉人”、“南人”的统治和歧视以后，中国与西洋、南洋的交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。“三宝太监下西洋”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。参加这次远航的人的亲历记，流传下来了，即有巩珍《西洋番国志》、费信《星槎胜览》、马欢《瀛涯胜览》等好几种。紧接着新航路的发现，佛郎机人（葡萄牙人）和红毛夷人（荷兰人）大举东来。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载，也开始比过去增多而充实了。如《皇明世法录》、《殊域周咨录》记佛郎机人：

“婚娶论财，责女奁货数倍。无媒妁，诣佛前相配，以僧为证，谓之交印。国有大故，亦多与僧谋。”（此处“佛”指天主，“僧”指教士。）

“每船二百人撑架，橹多人众，虽无风可以疾走。各铳举发，弹落如雨，其铳管用铜铸造，大者一千余斤。”

根据这些记载修成的《明史》佛郎机、意大利、和兰各传，面貌也和过去史书大不相同，真实材料多了，“海外奇谈”少了。

到万历、天启年间（1582——1622），耶稣会教士利玛窦、庞迪我、艾儒略、汤若望等陆续来华，开始系统地介绍有关世界地理、历史的知识。遮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、充满着神秘色彩的网幕，这时候便开始慢慢拉开了。

*

*

*

利玛窦1584年绘制的《坤輿万国全图》（初名《山海輿地图》），是第一幅在中国采用近世科学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。艾儒略1623年撰成的《职方外纪》，是第一部在中国刊行的关于世界地理的科学著作。

在此以前，中国一般的封建士大夫，对世界的全貌可说是毫无所知。利玛窦初到北京时，自称从大西洋来。署礼部尚书（负责文化教育和外交的最高官员）对皇帝说：“《会典》上只查到一个‘西洋琐里国’，没有什么大西洋，不晓得是真是假。”

《万国全图》的发表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学者极为重视；皇帝也命令利玛窦、庞迪我等教士，再从欧洲找来详细地图，翻译进呈。从此，中国人才第一次看到地球上的五大洲三大洋，才知道既不能说中国在世界中央，也不能说中国在世界的东极；亚细亚、欧逻（罗）巴、亚墨（美）利加、地中海、大西洋等地理名词，才开始在汉文中出现，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《职方外纪》是和《万国輿图》相辅相成的一部书。作者艾儒略（1582——1649）是意大利人，于1610年来华。他和利玛窦一样，先学习中国语文，再传播西洋文化和天主教。他用中文撰写的《职方外纪》五卷，自序说是“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，为增补以成一编，……或骇为奇，然而非奇实常；或疑为虚，然而非虚皆实。”

《职方外纪》第二章专叙欧洲，先总说欧洲的方位区划、

衣食住行、建学设官、宗教信仰、兵刑赋税，然后分述各国。书中颇有宣扬天主教“教化”和“奇迹”的糟粕，也杂采了一些“白羊变黑”、“小人与鹤战”之类的传说故事；但大体上确实可算“非奇实常，非虚皆实”。他所介绍欧洲各方面的情况，有许多过去在中国是完全没听说过的。比如司法审判：

“词讼极简。官府听断，不以己意裁决。所凭法律条例，至详至当。不事先加刑，必俟事明，罪定招认，然后刑之。官亦始终不加骂詈。即词色略有偏向，讼者亦得执言不服，就他官听断焉。吏胥恣虐，虽亦出于词讼，但因事大小以为多寡，立有定例，刊布署前，不能多取。”在阶级压迫严重，吏治腐败黑暗，刑讯逼供、贪赃枉法司空见惯的明季，把这些情况介绍进来，意义是相当深远的。——虽然艾儒略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*

*

*

新知识尽管已经介绍进来，旧观念却还顽强地盘踞在人们脑子里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。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修《四库全书》，纪晓岚在给《职方外纪》作“提要”时，还认为“五洲四海”之说“为自古舆图所不载”，“多奇异，不可究诂”。但他究竟是读过很多书的人，比顽固守旧而又不学无术的人高明，总算表示了一点宽大：“天地之大，何所不有？录而存之，亦足以广异闻也。”

科学知识被当作“异闻”，局限和偏见就会被牵为“知识”。当欧洲国家到广州要求通商时，有位满洲大员居然

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葡萄有牙，西班牙也有牙。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个国家？还不是洋鬼子捏出来吓唬咱们的吗？”

到鸦片战争前后，头脑最清醒的士大夫如林则徐、魏源者，提出要了解“夷情”，研究西洋各国的情况，才真正开始重视艾儒略等人的书。不仅如此，林则徐还请人译述欧洲的地理学著作，编为《四洲志》一书；魏源则亲自询问“夷人”，包括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战俘，写成了《英吉利小记》。但由于他们本人没有去欧洲游历考察，在讲到外国事情的时候，仍然难免有隔膜和误解的地方。

比如说，林则徐见皇帝时奏称：“茶叶、大黄禁不出洋，已能立制诸夷之命。”后来他力主开战英人必败，理由之一是：“夷人除枪炮之外，击刺步伐俱非所娴，而其腿足缠束紧密，屈伸皆所不便，若至岸上，更无能为。”他听说英国兵缠绑腿，就以为绑住了膝盖打不得弯；以此制定用兵方略，怎能够不误事？魏源叙述天主教，也相信教中有换心、挖目之事，引用别人耳食之言，说教士挖去目睛用于点铅成银，“必华人睛点之乃可；西洋人之睛，不济事也。”这都是因为缺乏直接了解的原故。

* * *

《海录》和《乘槎笔记》的价值，就在于冲破了两千年来一直未能克服的局限和偏见，对一直被认为是神秘荒唐的西方世界，开始有了直接的接触。常言道得好：“百闻不如一见”。讲多少次还讲不明白的东西，一看就能明白。众说纷纭不知孰是的事情，看后就可以判断。

谢清高是个“粗人”，但他亲眼看到的東西，也足以澄清某些傳聞的謬誤。過去的某些書中曾經有西洋人“掠食小兒”的說法，甚至言之凿凿，詳細介紹洋人蒸食小孩的方法。謝清高所看到的實際情況，却是歐洲人極其看重小孩，“雖奸生子（非婚生子），必長育之，無敢殘害”。在中國的傳教士美化歐人風俗，說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“平等、友愛”。謝清高所看到的實際情形，却是“俗貴富而賤貧，其家富豪，貧者雖兄弟叔侄皆不敢入其室，不敢與同食”。

《海錄》中談南洋、印度的篇幅很多，斌椿則專門游歷歐洲，他的觀察和記述，比謝清高更為詳細。他隨行帶了《瀛環志略》、《海國番夷錄》等書，沿途考其正誤。到歐洲後，又第一次見到火車、電報、紡織機、抽水機、高層建築等“產業革命”的成果。在瞞者里（曼徹斯特）參觀三千多人的紡織廠，“每機二三張以一人司之。計自木棉出包時，至紡織染成，不逾晷刻，亦神速哉！”參觀倫敦公議厅（國會），見到“各鄉公舉六百人，共議地方公事。意見不合者，听其辯論。必眾論全同，然後施行，君若相不能強也”。……所有這些，都給這位從東方古老封建國家來的客人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李善蘭在給《乘槎筆記》寫的序中，對斌椿有機會到歐洲大開眼界表示羨慕。他感慨地說“舉天下之人，其足迹有不出一郡者矣，有不出一邑者矣，甚至有終身不出里巷者矣。……中外限隔，例禁甚嚴。苟無使命，雖懷壯志，徒勞夢想耳。”李善蘭這番話反映了當時願意接受新思想、